

围剿象牙塔里的罪恶

——学校人员违法犯罪问题研究

杜雄柏◎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围剿象牙塔里的罪恶

——学校人员违法犯罪问题研究

杜雄柏◎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围剿象牙塔里的罪恶——学校人员违法犯罪问题研究 / 杜雄柏著. —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7-5620-3901-3

I. 围… II. 杜… III. ①高等学校-教育工作者-犯罪-研究-中国 ②大学生-青少年犯罪-研究-中国 IV. ①D917 ②D66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2100号

- 书 名 围剿象牙塔里的罪恶——学校人员违法犯罪问题研究
WEIJIAO XIANGYATA LI DE ZUIE XUEXIAO RENYUAN WEIFA FANZUI WENTI YANJIU
- 出版发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
北京100088 信箱8034 分箱 邮政编码100088
邮箱 zhengfadch@126.com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010) 58908586(编辑室) 58908285(总编室) 58908334(邮购部)
- 承 印 固安华明印刷厂
- 规 格 787mm×960mm 16开本 22.5印张 400千字
- 版 本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5620-3901-3/D·3861
- 定 价 48.00元

- 声 明
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 由出版社负责退换。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论语·雍也》

学校一定要严守诚信的底线，培养出的学生才会是诚实的，这样社会上即使有造假之风，也终会被净化。如果学校这方净土失守了，也开始造假了，社会就没有希望了。

——朱清时

仅仅知道关心利润的社会，肯定要覆亡的。那里，挣钱成了人生的第一需要，成了地位、快乐和幸福的化身，成了成功的主要尺度，深深的危机就潜居其中。

——〔英〕琼·罗宾逊〔1〕

即使在平等双方自由缔约为基础的社会里，如是人人都以眼前的功利观点作为行动的指导，则这个社会将不永天年。

——〔奥〕约瑟夫·熊彼特〔2〕

〔1〕 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1903～1983），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新剑桥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和实际领袖，世界级经济学家中惟一的女性，被公认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女性经济学家。

〔2〕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奥地利籍，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对推进世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做出过卓越贡献，被认为是一位有深远影响的经济学家。

Contents

目 录

绪 论 学校人员违法犯罪：一个不得不重视的话题 / 1

- 一、学校教育在社会文明与进步中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 1
- 二、把教育问题解决好应当重视学校人员的违法犯罪问题 11
- 三、本研究的目的、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及拟探讨的主要问题 15

第一章 学校人员违法犯罪问题研究概况 / 22

- 一、国外对学校人员违法犯罪问题的研究 22
- 二、国内对学校人员违法犯罪问题的研究 54
- 三、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设想 78

第二章 学校人员违法犯罪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趋势 / 92

- 一、学校人员违法犯罪的发生 92
- 二、学校人员违法犯罪的发展 98
- 三、学校人员违法犯罪的变化趋势 102

第三章 学校人员违法犯罪的数量和类型 / 109

- 一、学校人员犯罪的部分数据 110
- 二、学校人员犯罪的基本类型 118

第四章 学校人员违法犯罪的特点与危害 / 199

- 一、学校人员犯罪的主要特点 199
- 二、学校人员犯罪的严重危害 211

第五章 学校人员违法犯罪的原因及其相互作用 / 226

- 一、分析前提的确定与解释 227
- 二、学校人员犯罪的一般原因 230
- 三、学校人员犯罪的特殊原因 251
- 四、学校人员犯罪现象的产生机制 262

第六章 学校人员违法犯罪的预防与控制 / 274

 一、学校人员违法犯罪的预防 276

 二、学校人员违法犯罪的控制 300

第七章 学校人员违法犯罪的认定与处罚 / 306

 一、体罚与惩戒的认定与处罚 306

 二、剽窃与引用的认定与处罚 315

 三、管理与监护失职的认定与处罚 321

 四、受贿与收受红包的认定与处罚 335

参考文献 / 341

后 记 / 346

绪论

学校人员违法犯罪： 一个不得不重视的话题

学校，按辞书的解释，是指从事知识传播和人才培养的专门机构。据考证，学校在人类社会上的出现，无论中外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的原始公社后期，就有了学校教育的萌芽，经过夏、商，到西周和春秋时期便形成了比较定型的学校。《礼记·学记》所载“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就是证明。当时，不仅学校教育的形式多样，而且还设有专门机构和职官来加以管理。据《周礼·地官》记载，管理教育的人员分有“师氏”和“保氏”。师氏的编制有139人，其职能是以“三德”、“三行”教国子；保氏的编制为73人，其职能是以“六艺”、“六仪”教国子。尽管这种学校主要是用来训练贵族子弟的，即所谓的“公学”，但是就其组织形式而言，已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学校教育。在西方，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同样也有了比较完备的学校——不仅初、中级学校的存在比较普遍，而且在公元前387年就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比较正规的高等学府。^{〔1〕}

一、学校教育在社会文明与进步中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

学校教育，就其产生而言，是伴随着人类社会性生产劳动的发展，由父母对子女或师傅对徒弟传授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艺的教育训练而逐渐形成的。按照摩尔根的理论，人类的史前期可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三个阶段。在蒙昧时代的低级阶段，即人类的幼年期还只能栖息在树上来躲避猛兽的袭击，以求得生存。到了中级阶段，尽管使用的是未经琢磨的粗石器，但许多劳动技能，如“钻木取火”、烘烤食物等，并不是猿人生来就能掌握的，这就有传授和学习的需要。到了这个时代的高级阶段，发明了弓矢，狩猎成为重要的劳动部门。发明这种工具并掌握它，既需要长期积累的劳动经验，也需要较高的技能和智慧。如果

〔1〕 该所学校由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于公元前387年在雅典创办，名为阿卡德米（Academy），又称“柏拉图学园”。据称，该校为西欧最早的一所高等学府。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数学、天文、音乐和哲学。

没有与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的教育训练,让年幼的一代较快地掌握它是完全不可能的。至于到了原始社会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时代,有了陶器的应用、家畜的驯养、植物的栽培、铁矿的熔炼等,就更需要教育和训练的作用。就是说,原始人群的生活虽然极其简单,但是他们还是需要教育后代怎样制造和使用简单的石器劳动工具,怎样团结互助进行集体的采集和狩猎的生产活动,并怎样同毒蛇猛兽及其他自然界威胁进行斗争,以保证集体的生活和安全。显然,如果没有一定的教育训练,已为人类社会所积累的劳动生产经验和技能便不可能继承和传递下去。至于师徒式的教育训练为何会发展演变成为专门的学校教育?亦即社会为什么需要兴办学校?道理很简单,无非就是由于学校教育在传承人类思想文化成果、开发民智、促进社会文明和进步等方面比一般零散的非正规的教育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从学校教育的起源来看,无论是创办学校的人、还是从事学校具体教育活动的人(主要是教师),其传播知识、培养人才的初始动机无疑都是十分纯洁和高尚的;学校教育在后来数千年的演变中,尽管出现了某种异化,^[1]甚至出现了诸如我们今天的学校教育中所存在的许多让人难以置信和容忍的违法犯罪问题,但是谁也无法全然否认学校在推动社会进步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我们关注和研究学校教育出现的问题,本身就是以承认,或者说是肯定学校的价值为前提的。研究它所存在的问题的目的,无非也就是为了使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努力继承其优秀的传统——在培养人才、推动人类社会文明和进步的过程中能更好、更充分地发挥其独特的优势,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知道,社会是由单个的人组成的集合体。个人与社会互为前提,无个人便无以成为社会,反过来,无社会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人。就是说,人是社会的人,社会也主要是由人构成的社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谓社会就是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共同体。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性。^[2]社会生活的和谐需要个人对社会秩序的自觉遵从与维护,个人幸福的获得除了个人的努力之外,也少不了社会为其提供相应的条件。构成社会集合体中的每一个人,就先天条件(如生理构造、心智发育)而言,一般地说,相互之间不会存在多大的差别,但降生之后各自所处的生活环境却具有极大的不同:如

[1] 这种异化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随着私有制的出现,接受教育变成了少数人的特权;二是随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教育越来越脱离物质生产劳动。尽管这种“异化”现象的发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它毕竟阻碍了教育社会功能的充分发挥。

[2]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出身于豪门望族、官宦世家的人，因家境殷实丰厚，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多，那么无论是生存，还是发展也要安逸和顺畅得多；而出身于贫寒家庭的人，由于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往往都不具备，那么人生道路自然就要艰辛和坎坷得多。不过，社会生活的经验事实也表明：一个人先天所具有的条件，无论是优裕还是恶劣，都有可能随着后天个人努力程度的不同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即使先辈为其留下万贯家产，也为其搭建了施展拳脚的舞台，但倘若饱食终日，不思进取，也会很快耗费得一干二净，变得穷困潦倒，成为穷光蛋；相反，假若不屈从命运的摆布，努力抗争，即使出身低微贫寒，也有可能摆脱贫困、出人头地，进而变得风光无限。尽管这一般地都需要经历一个非常艰难、曲折的奋斗过程。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生物都具有趋吉避凶的天然本能，而人首先是作为一种生物体而然后才成其为人的。作为一种生物体，人无疑也具有趋吉避凶，或趋乐避苦的生物性本能。然而，人又不同于一般的生物，他不仅有获得生存所需要的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欲望，而且还有用以表明其作为人而存在的、体现其人生价值的强烈精神追求。就是说，人不是像其他生物那样仅仅满足于简单的生存和生活，他还有更高的目标价值追求。趋乐避苦的生物性本能以及永无止境地追求人生价值的社会性欲求，使得每一个人（更不用说处于艰难困苦之中的人）都不可能，也不会消极地听从命运的摆布，他会奋力抗争，以获得更优裕的物质生活和更充实的精神享受。基于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深刻反思，富者领悟出“富要读书”的生活道理；穷者发出了“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的呐喊。“富”者为什么“要读书”，就是因为读了书，就具备了生存竞争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就不仅不会由“富”变“穷”，而且可挣得更丰富的物质财富、获得更充实的精神享受。“穷”者之所以“要干，要革命”，就是因为不“干”、不“革命”，就无法改变任人宰割、遭受欺凌与屈辱的命运。由于富者和穷者之间在心智发展水平上并不存在什么天然的差异，所以二者不仅都能深切地感受到生存竞争的激烈和残酷，而且都会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可能，自觉地寻求怎样才能避免或摆脱贫穷、赢得竞争胜利的途径和方法。

以“革命”的方式变“穷”为“富”，则意味着对既有社会利益格局和生活秩序构成冲击和破坏。尽管改变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和生活秩序的意愿合乎情理，但其行为毕竟要使现存社会遭受一定程度的损失，同时也可能使个人“得不偿失”（如丢掉身家性命）。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因各自所追求的人生价值目标和用以实现目标的手段、方式和能力等方面的不同，相互之间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在人类发展史上，由无序的求名逐利和严酷的生存竞争而导致的一幕幕血淋淋的人间惨剧，使智慧的人们逐渐意识到：要求得生存条件的真

正改善，不应完全寄希望于对既有财富的争夺，而是要通过全体社会成员的努力去创造，以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才有可能。因此，便有了诸如“发展才是硬道理”之类的理性总结；同时，任何个人幸福的取得和人生价值的实现，也必须以尊重他人的权利为前提。于是，对社会生活便有了追求“公平”和“正义”的强烈要求，以及为实现和维护这种“公平”和“正义”的道德、法律等行为规范。因为任何人的一意孤行和轻率鲁莽都将事与愿违——既侵害了他人，最终也有可能毁灭了自己。那么，怎样才能使人们过一种和平、宁静、康乐、舒适的生活呢？英国的大思想家伯特兰·罗素在其名著《自由之路》中所说过的一段话也许对我们解答这一问题有所帮助。罗素认为：“人类若是希望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必须克服两种障碍：一种是自然的障碍；另一种是人为的障碍。广泛地说来，我们可以通过科学来克服自然障碍，并通过政治和社会组织来克服人为的障碍。”“只有通过劳动，自然才能为我们提供产品”，“必须付出一定的劳动，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这种必要性并不是政治制度和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强加在我们头上的，这是由于社会改革家，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必须承认和了解的自然规律。”^{〔1〕}“必须付出一定的劳动，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是一种“自然规律”，而“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好恶等意愿能够发生改变的，我们人只能顺从和驾驭它。

顺从和驾驭“自然规律”，既是人类自我意识的一种觉醒，也是人类最高智慧的集中体现。

也许正是基于这些简单道理的深刻认识，人们逐渐意识到创办学校的必要。因为学校通过科学技术知识的传输、人才的培养以及社会组织管理方法和社会生活规范的传播，能对人类在“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过程中消除上述“必须克服”的“两种障碍”，发挥出其他部门或机构无与伦比的作用。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是构成社会生产方式中的两个基本因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生产力水平的迅速增长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关系的改善又极大地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试看又有哪一种社会形态，抑或哪一种社会形态中的哪一个发展阶段的社会生产力不是由教育，更确切地说，不是主要地由学校教育的作用而促进和提高的呢？哪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不是主要地由学校教育的作用而改善和进步的呢？社会的发展要依赖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须知，无论是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还是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实际效果的产生和形成都离不开教育。教育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作用具体表现为：一是教育把一部分人在生产劳动中

〔1〕〔英〕伯特兰·罗素：《自由之路》，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7页。

所积累的经验 and 技能加以总结，并普及、推广给其他社会成员，使这些经验和技能在更大范围内得到运用，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二是教育用“对人类真正有益”的知识引导、培养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社会精英，使他们心无旁骛、矢志追求真理、献身科学，从而既保证了人类社会文明成果的顺利传承，也因精英们的创造性劳动使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得以提升；三是教育把抽象的科学理论转化为可实际应用的技术，以及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使科学技术的潜在功能作用得以显现，即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导致了社会财富总量的不断增加。社会的发展同样需要和谐的人际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生产关系）。同样，我们看到，无论是这种关系的培育和建立，还是这种关系的维系和发展都离不开教育。教育（主要是学校教育）改善和推进社会生产关系的作用具体表现为：一是教育对真假对错、善恶美丑的分辨甄别，抑恶扬善，矫正了人的是非观念，提高了识别真假对错、善恶和美丑的能力，从而有利于培养出是非分明、人格健全、品行端正的社会成员；二是教育把社会业已形成的、用以维系社会秩序的一般道德规范和其他行为准则传授、灌输给“失足者”和新加入的社会成员，使之不仅不至于因“无知”而去侵害他人或社会，而且还有可能使之成为社会行为规范的模范执行者和自觉维护者，从而有利于良好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秩序的形成；三是教育能有效借鉴、消化和吸收外域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和先进的管理工作经验，这不仅有助于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而且能通过取长补短，极大地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和进化程度。事实上，正是由于学校教育具有上述这些作用，所以，自学校诞生以来，人们不仅对它寄予厚望，而且积极支持其发展，加之学校工作人员尽职尽责、无私奉献，学校在克服上述“两种障碍”、促进社会文明与进步等方面的确发挥过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巨大的影响作用，以至于人们对之大加讴歌和赞赏。例如：把学校喻之为“人类文明的摇篮”，把学校所从事的教育事业称之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把从事学校教育工作的人谓之“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看到，从大的方面而言，一切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和战略家或基于自己的国家、或基于本民族、或基于整个人类的利益，无不重视和支持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们不仅不厌其烦地阐释、强调学校教育在促进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所具有的重大作用，以唤醒人们的认识，而且还身体力行地创办学校、从事具体的实际学校教学或管理工作；小到一个家庭来说，又有哪一位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子女通过接受良好的学校教育而成“龙”成“凤”，做一个有出息、有作为的人呢？

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社会信息急剧增加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空前复杂频繁、生存竞争日趋激烈的现代社会，任何一个人要

想获得一定的知识,拥有生存竞争所必备的能力,事实证明,已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直接参加变革现实的每一项实践活动,更多的是利用间接的方式,即通过接受学校教育的方式来实现。学校教育之所以能担当起这一重任,还因为学校教育,一般说来,不仅所提供的知识内容具体、精准、科学、健康向上,而且传授知识和技能的方式、方法灵活多样,它能以专门的、快捷和让人易于接受的方式^[1]满足不同社会成员对知识和技能的需求。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已成为现代人不可或缺的人生内容之一。一个人无论从事哪一种职业,选择哪一种生活方式,莫不如此。有研究资料显示:一个人接受学校教育年限的多少同他所谋求社会职位的高低以及获取社会财富的多寡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不接受相应的学校教育就很难,甚至可以说,不可能进入某些职业领域,从而获得相应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在生存竞争空前激烈、异常残酷的现代社会,不要说一个人不接受一定的学校教育不行,同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说不重视学校教育不行,就是重视程度不够也不行。落后就挨打,这是人们从社会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落后”一词,一些人仅仅理解为经济的落后,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浅薄和片面的认识。就其实质而言,应该说主要的是文化的落后,或者说教育的落后。因为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或水平的高低归根结底取决于科学技术,或者说教育发展水平的高低。所以准确地说,是由于“教育的落后”直接导致了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因此,我们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要想从根本上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要想有一个兴旺发达的前景,也只有通过发展教育的途径才有可能。于是便有了“教育兴国”一说。^[2]

“教育兴国”,也就是用发展教育的方式使国家变得繁荣富强、兴旺发达起来。事实上,教育的确能做到这一点。对此,我们的近邻——日本和韩国在极短的时期内迅速崛起的史实就是很好的例证。为了增强人们对“教育兴国”科学含义的理解,在此,我们不妨简要述说一下这两个国家的情况。

〔1〕许多社会性的措施或手段都可以对一个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产生规范和制约作用,但是就其效果而言,都很难与教育相比较。譬如,经济的手段、行政的手段和法律的手段运用起来十分简便,其作用效果也特别明显,但由于都具有强制性,所以很难解决实质性问题。而教育以劝诫、说服和引导的方式去影响人,“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故特别易于被人所认同和接受,这对于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而言,其效果尤为显著。

〔2〕在我国所提的是“科教兴国”。“科”,是指“科学”;“教”,显然是指“教育”。用发展“科学”和“教育”的方式来振兴国家,无疑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或要害,是一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最佳决策行为。不过,就“科学”与“教育”二者之间的关系而言,我们认为“教育”更为根本,因为无论是科学人才的培养,还是科学成果的形成和转化都离不开教育的作用,况且许多国家的事实也表明,一个国家只要教育发展水平提高了,那么其科学技术水平也必将随之提高。

日本素来就是一个物质资源非常匮乏的国家，但是他们早在19世纪中后叶就从闭关锁国的教训和欧美国家迅速崛起的神话中，悟出了一个国家发展速度的快与慢并非全然取决于所拥有的物质资源的多与少，而主要在于其人力资源开发程度高与低的道理。如何开发人力资源？最有效的方式无疑是发展教育。是故，自明治维新始，他们就狠抓教育。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们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就必须增进一般民众的知识；要振兴近代工业，就要培养推进这一事业的人；要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面貌，就要在全国范围内兴办学校，普及教育。据说，当时为生活所迫的民众并不十分愿意把孩子送进学校，政府却不惜一切代价，努力提高就学率。到1882年，日本义务教育就学率超过50%，1905年超过90%，1920年（大正9年）超过了99%。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一书中总结日本明治维新后百年来的发展历程时说过，“为了实现近代化而如此重视教育事业，这是日本近代化的一大特点。”^{〔1〕}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46年底，日本政府便规定在小学6年和中学3年期间实行义务制教育，此举得到国民的热烈拥护。全国上下一致认为：“要使日本复兴，除教育以外别无他途，我们由于进行战争而使国家荒芜，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留给子孙后代，但是至少希望他们受到卓越的教育。”^{〔2〕}长期以来，日本把办教育作为发展经济的最大投资，所以其教育投入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1885年教育经费占人均国民收入的1.8%。近几十年来，一般都保持在6%的水平上，个别年份高达6.8%。教育经费在行政经费中所占的比率，在明治至大正年间，一直是10%左右，现在则占到21%~23%，为世界之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日本的乡村中最好的建筑物是小学校舍。由于政府长期以来对教育的极端重视（在有关教育的立法、资金投入和改革方面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使日本教育及其人力资源开发迅速跃居世界领先水平，经济发展在不同时期内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并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经济发展大国。日本早稻田大学依田熹家教授不无感慨地说：“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成功地建设现代化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大抓了普及教育、培养人才这个‘百年大计’……日本由于普及了中等教育，因而拥有大量中层科技人才，这是日本在战后引进、吸收、消化国外先进技术的重要条件，也是欧美国家在工业技术上败给日本的原因之一。”^{〔3〕}吉田茂也认为，“教育在现代化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大概可

〔1〕〔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2〕〔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3〕转引自连瑞庆：《社会发展与教育——教育的社会功能及战略目标》，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0~21页。

以说是日本现代化的最大特点。”〔1〕

韩国，在1945年光复之前真可谓是“一穷二白”：他们既没有工业化基础，也没有教育文化发展基础。据说，当时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尚不足20%；全国165所幼儿园中仅有3所属于公立；小学就学率仅为64%。光复之后，韩国历届政府励精图治，坚定不移地奉行“教育先行”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他们认为，人力是最宝贵、最富饶的资源，具有良好教育程度的人力资源是经济开发最重要的基础。经过50多年的努力，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使小学入学人数占同龄人口的比例达到100%；高中阶段教育入学率从1980年的50%左右提高到1990年的90%；大学入学率从1975年的10%提高到1995年的50%，目前已经达到66%。这几项指标都超过了英、法、德等几个主要西欧国家的水平。1999年，韩国25岁~64岁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50年。〔2〕在如此迅速发展教育和快速提高人力资源水平的支撑下，韩国经济迅速崛起。1962年，韩国开始实施第一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期，1962~1967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7%，1967~1971年平均每年增长11.5%，1972~1976年平均每年增长11%。根据麦迪逊（Maddison）（2001年）的计算，1950年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相当于西欧国家（12个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的15%，1973年达到后者的23.3%，1993年上升到60.4%。〔3〕1995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 823美元，〔4〕突破1万美元大关。1962~1995年中，韩国实现了年均经济超过8%的快速增长。1996年成功地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实力一跃升入到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成为世界上又一个依靠快速发展教育、实现经济追赶的新兴国家。正如我国学者陆璟所指出的：“韩国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在非常薄弱的基础上实现人力资源水平的快速提高，并支撑其经济实现快速赶超，就在于韩国政府采取了加强教育投入，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办学，重视普及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不失时机地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以及产学研结合等基本方针。”〔5〕

当下，人们普遍认为我们所处的社会已进入到“知识经济时代”。何谓“知识经济”？按我们的理解，无非就是指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或慢主要地取决于所拥

〔1〕〔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2〕根据OECD Education at a Glance 2001 p44表2.1b中的数据计算。

〔3〕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OECD2001, P. 276~277.

〔4〕2002 Korean in Figures 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Republic of Korean, p. 49, <http://www.nso.go.kr/eng/info/e-figures.htm>.

〔5〕陆璟：“韩国：后发国家追赶的典型”，载《教育发展研究》2003年第3期。

有的知识的多或少。而知识的获得在现代条件下主要地依赖着教育^{〔1〕}，是教育把最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直接传授给受教育者，极大地提高了他们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从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实，知识或者说教育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何止仅仅体现于现代社会，它同样鲜明地体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所有历史阶段。尽管古代人所具有的“知识”同我们现代人所拥有的“知识”相比较，无论是其数量还是其质量都有很大的差别，甚至可以说，不可同日而语，但作为一种“生产力要素”，对当时的社会经济，乃至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都是不可低估的。就古代来说，试看在四大文明古国（古印度、古中国、古埃及和古巴比伦）中又有哪一个国家只有发达的经济而没有发达的文化教育？或者说只有发达的文化教育而没有发达的经济？在近代，教育在发展经济和促进社会文明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样也是十分显著的。曾几何时，如日中天、强大无比的中华帝国到了近代为何抵御不了西方列强的进攻？任其瓜分、蹂躏和宰割？在探讨其原因时，人们看到了是由于西方人拥有“坚船利炮”。但值得我们深究的是：人家的坚船利炮是由何而来呢？说到底，还不是由先进的文化、先进的教育使然！至于现代，教育在发展经济和促进社会文明中所发挥的作用则尤为显著。有统计数字表明：1950～1962年7月，教育在增加国民收入中起作用所占的百分比，美国为15%，比利时是14%，英国为12%。1960～1980年，美国的教育事业为国民收入的增加做出了19%的贡献。前苏联的经济学家指出，苏联国民收入的25%～27%是通过提高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取得的。一个人多受1年初等教育可使劳动生产率提高30%；一个熟练工人进修1年可比他呆在原生产岗位上提高的劳动生产率高达1.6倍。1910～1955年，挪威的固定资本每增1%，生产只增加0.2%；劳动力每增加1%，生产增加0.7%；而增加1%的经过训练的管理人员，生产则增加1.8%。^{〔2〕}20世纪60年代，日本进行过一次关于教育对经济作用的估测，结果表明：在1905年～1960年的55年里，教育投资约增23倍，同一期间的国民收入增加近10倍，国民收入总增长部分的大约25%来自教育投资的增加。就是说，教育虽然不能直接生产机器、粮食和棉花，但是它能通过提高人的素质，提高社会的生产和管理水平，进而创造出更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促进整个社会的物质文明

〔1〕“教育”的外延很广，既包括学校教育，也包括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尽管这几种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缺一不可，但是就作用效果之大小而言，后两种教育都不如学校教育。所以，说到教育，一般指狭义的教育，即学校教育。

〔2〕参见连瑞庆：《社会发展与教育——教育的社会功能及战略目标》，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4、20页。

和精神文明的快速发展。

学校教育在发展经济、促进社会文明与进步中所具有的重大作用在当今时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所重视。我们看到,一些有远见的思想家、政治家无不十分强调发展学校教育的重大作用。早在20世纪中期就有学者指出:“21世纪,国与国的竞争,综合国力的比赛,最紧要并有决定性的,是公民的教育文化水平。水平高的占优势,水平低的处劣势,甚至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这就是智力战。”^{〔1〕}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也说过:知识正超越土地、人工、原料,甚至资本等一些有限资源而成为取之不尽的核心资源,一种弹性的生产要素。1988年,美国的老布什在竞选的时候就许诺要当一名“教育总统”。上任半年,他就提出了一个《1989年优化教育法案》,划拨巨款,从财政上大力支持学校教育改革。随后的克林顿在1996年也以抓教育为承诺,赢得选民的支持而连任。^{〔2〕}据报道,随后的小布什为求得连任也在许诺要“淡化”战争转而重视教育问题,只是由于没有提出实质性的举措而落选。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更是高瞻远瞩,早在1985年5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就认为:“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教育工作不仅要抓,并且要抓紧、抓好,严格要求,少讲空话,多做实事”。他不无忧虑地告诫我们:“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即“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引者注),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3〕}邓小平甚至认为:“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是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把教育问题解决好。”^{〔4〕}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1999年5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也指出:“在当今世界上,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竞争。无论就其中哪一个实力的增强来说,教育都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将教育纳入战略发展重点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布局之中,切实把教育作为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工作,摆到优先发展的战略重点地位。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抓好教育工作,坚持在制定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时保证教育优先的适度超前发展,坚持在安排各级财政预算时实现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

〔1〕 转引自宦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若干问题”,载《未来与发展》1980年第1期。

〔2〕 据说克林顿在连任总统后,立即将1998年联邦预算中的教育拨款提高到510亿美元,比1997年增长了20%。在1997年2月4日的国情咨文中用了1/3的篇幅专门谈教育改革问题。人们注意到,这是美国在20世纪内阐述教育问题最多的一次总统国情咨文。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121页。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

提高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为教育优先发展提供物质保证。”〔1〕

二、把教育问题解决好应当重视学校人员的违法犯罪问题

“要把教育问题解决好”，不仅表明了人们对教育能极大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作用具有深刻的认识以及利用教育以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强烈愿望，而且也透视出由于我们的教育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而在人们心里所形成的丝丝隐忧。

的确，学校教育只是众多的社会活动形式之一，表面看来其活动内容似乎很单一，不难办，但事实上它也是一项涉及诸多要素和关系的复杂工作。要想把它所存在“问题”解决好也绝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就我国的现实情况而言，要把学校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解决好，不仅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需要全党上下，乃至全体国民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关心和支持，而且需要高层决策者的英明决策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尽职尽责。不过，就实际意义而言，我们认为从事学校具体教育工作的人员的脚踏实地、积极努力、尽职尽责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即使决策者和民众重视、关心和支持学校教育工作，国家也颁布了一些有利于教育事业发展的政策法规（这当然是极其重要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由于学校教育是一项十分繁杂而具体的事务性活动，每一项具体工作都需要他们去落实和完成，加之他们也都是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人，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也需要获得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条件。所以，即使我们有好的政策法规，这些政策法规在实际贯彻的中间环节不会变形走样（这一点往往也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如果没有从事具体教育工作的人员的忠于职守，认真贯彻与落实，那么再好的政策法规也将是一纸空文。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在探讨我国学校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包括违法犯罪）的原因时，虽然既要看到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还存在许多制约学校教育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问题，我们的教育指导思想存在偏差，教育观念还比较保守、陈旧（某些方面又表现为偏激），具体的教育政策法规也存在不少问题，甚至严重错误，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从事学校具体教育工作的一部分人员（包括校级领导、各职能部门的管理者和一般工作人员、普通教师和学生）的思想情感、职业操守、言行举止等方面也存在许多与其培养人的工作性质格格不入，甚至相背离的问题，日趋严重的违法犯罪就是其突出的表现。

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一问题予以探讨，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

众所周知，从事学校教育的具体工作人员的基本工作职责不外乎就是为社会培

〔1〕 载《人民日报》1999年6月16日，第8版。